

# 近代中国直面“道出于二”

沈 桢

“道出于二”一语出自王国维。这位清末著名学者高屋建瓴，言简意赅地说：“自三代至于近世，道出于一而已。泰西通商以后，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，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。”彰显出我国近代巨变的是传统之“道”在西方新兴之“道”的冲击下，退缩为竞存的一隅之“道”，两者的相峙、对抗、消长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。

中国自秦代始，沿袭的就是“道统”，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这一道统似是永恒的。汉代确立“独尊儒家”后平添了“道统”的精神支柱。满族作为异族入主中原，沿袭其“道”，清政府信守的依然是“王者无外，天下一家”（以“朝贡体系”为基本框架）的观念。梁启超在19世纪末说：“以今日论之，中国与欧洲之文明，相去不啻霄壤”；张之洞更是认为“各国”自庚子后，“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，不以同类相待”。

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碑，中世纪古老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逼迫下走入近代的第一步，朝野以不同视角和旨趣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：中国向何处去？然而，他们寻求经验教训或思想资源的指向不再是“向后看”，而是“向外看”。对西方的认知，由贬义的“夷”到平等的“西”再到尊崇的“泰西”，与之相配应的是从“夷务”到“洋务”再到“时务”。

回眸我国近代“道出于二”的历程，洋务派率先把目光转向了西方之“道”——仅止于器

物层面，洋务运动提出的口号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学习西方之“道”相统一，这一时代内容无疑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历史方向。就“中体西用”这一中西文化交冲汇融的特定形式的主观动机而言，洋务派未必有心打破传统之“道”，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传统之“道”的趋向。维新派所展示的社会政治蓝图显然甚于洋务派，他们由“师夷技”走向“师夷智”，由“变器”走向“变法”，戊戌变法在“道出于二”的选择上，比洋务自强运动走得更远，康有为们向往的是从“大一统”变成“万国林立”的竞争局面。维新派把旨在“变政改制”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，自是喋喋不休地讲“西艺”“西政”，但当西方之“道”溢出其心中设定的界线时便又露出了卫道士面目，“绝无干犯皇室尊严之心”，一语道破其以立宪挽救清朝危亡之初衷。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，对戊戌变法既否定又发展，不懈地以西方之“道”挑战清政府顽固秉持的传统之“道”，力图从根本上变革其政治方向、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，辛亥鼎革后成立亚洲首创的共和制以取代帝制，彻底动摇了“道出于一”的根基。由此引发的变局，诚如学者杜亚泉当年所说：不止是“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”，更是“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”。

自鸦片战争失败后，虽说清政府每每显示出“守道”的自信和“攘夷”的冲动，但直面西方之“道”——仅止于器

物层面，洋务运动提出的口号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学习西方之“道”相统一，这一时代内容无疑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历史方向。就“中体西用”这一中西文化交冲汇融的特定形式的主观动机而言，洋务派未必有心打破传统之“道”，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传统之“道”的趋向。维新派所展示的社会政治蓝图显然甚于洋务派，他们由“师夷技”走向“师夷智”，由“变器”走向“变法”，戊戌变法在“道出于二”的选择上，比洋务自强运动走得更远，康有为们向往的是从“大一统”变成“万国林立”的竞争局面。维新派把旨在“变政改制”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，自是喋喋不休地讲“西艺”“西政”，但当西方之“道”溢出其心中设定的界线时便又露出了卫道士面目，“绝无干犯皇室尊严之心”，一语道破其以立宪挽救清朝危亡之初衷。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，对戊戌变法既否定又发展，不懈地以西方之“道”挑战清政府顽固秉持的传统之“道”，力图从根本上变革其政治方向、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，辛亥鼎革后成立亚洲首创的共和制以取代帝制，彻底动摇了“道出于一”的根基。由此引发的变局，诚如学者杜亚泉当年所说：不止是“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”，更是“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”。

很显然，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威逼利诱，其“道出于一”日渐淡化而徘徊、挣扎于“道出于二”层面，中西向新旧转换，传统的“道”式微，（直至以“打倒孔家店”开启中国现代社会的大门），而西方之“道”盛行。20世纪的几次政权递嬗，几不曾影响这一基本的格局和走向，所变的只是向谁学、学什么、怎么学，以此探索着日臻梁启超当年所向往的“世界之中国”愿景的路径。

某开放式公园建成一大池塘，池塘环境优美，条件优越，池水清澈，一些游泳爱好者陆续前来游泳。为避免发生意外事故，避免被问责，避免招惹冤枉官司，公园管理处每天派专人阻拦，但收效甚微。

为了免责，公园管理处在池塘边树立禁止游泳警示牌：池水较深，严禁游泳，风险责任自负。不料，禁而不止，适得其反，远近游泳爱好者、钓鱼爱好者，以及想免费洗澡、免费洗衣者蜂拥而至，导致公园管理秩序日益混乱，池水日益肮脏。为此，公园管理处加立禁止牌：严

禁钓鱼！严禁洗澡！严禁洗衣！  
四个严禁的警示牌没有起到禁止作用，反而产生逆反提示作用，公园管理处毫无办法，只好听之任之。一日，市环保监测站检测水质，检测结论：严重污染，水体有毒。

看罢水质检测报告，公园管理处主任立即指示工作人员采取措施，更换警示牌，牌子上只刷四个大字：水体有毒！

四个禁止，不如一个恐吓。游人看到“水体有毒”四个大字，立即退避绕行。

从此，池塘周边慢慢冷清寂静起来。



见缝插针

仲 海



美颜功能  
姬大利

## “光宗耀祖”的魔咒

孙建兴

一位贾姓友人，时常会聊出一句话：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。话听久了，也就习以为常了，知道他是想借《红楼梦》的诗，去沾点“贾氏”的贵气。

封建社会消亡了，但亡的是制度，封建思想仍然存在着，尤其是氏族中攀附贵的习俗，一贯是中国社会极为热衷的追崇。

就拿《红楼梦》来说，贾、王、史、薛四大家族，乘的就是祖上荣光：贾氏的“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”；史氏的“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”；王氏的“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”；薛氏的“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”。

唯物主义与封建思想格格不入，可世俗上似乎也不情愿把这种习俗，从倡导的新思想中剥离出去，认为“祖上荣光”也是应当承袭的遗产，以至民间的祠堂祖庙，几经浩劫尚能完好地保留下来。

但凡有祠庙的，祖上大抵非绅即贵、抑或历史上留下过浓重墨彩的——这是氏族的荣耀！即便家道破落，后人也会固守着这块宗牌。

“攀附贵”成了追崇，没有显赫族史的人，往往就会以姓觅贵，哪怕没有血统，只要姓氏对得上，也会不乱章法地炫耀一番。这不奇怪，五百年前是一家嘛！尽管看似简单，可真要认祖归宗就难了，历史学家都头疼过：刘邦、朱元璋的祖上是谁呢？史册上，只有他们的后人，却考证不出他们的祖先。他们是“草根皇帝”，籍籍无名的祖宗就算再本分，也是传不过几代的。

元朝人石君宝，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：为人者，或为显祖的后人、或为后人的显祖！他鲜明地抛出一个令国人700余年都摆脱不掉的魔咒——光宗耀祖！

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“光宗耀祖”作为一种氏族情怀，虽说格局狭隘但也算积极。做显祖谈何容易啊，更多人无非想出人头地，以飨后人的缅怀罢了。但“出人头地”就要去搏取功名利禄，“光宗耀祖”就要具备能满足氏族欲望的资本。

《无常经》道：常求诸欲境，不行于善事。“光宗耀祖”之所以被称作魔咒，源于氏族情怀打开的是邪恶的欲境之门。

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、“蝇附骥尾而致千里”，欲念的狭隘性与私利性，使氏族人成了不劳而获的享乐者，“天降大任于斯人”也蜕变成为“光宗耀祖”为己任。

清朝大贪官和珅，就是在魔咒下变成了魔鬼，一首绝命诗，道出了“光宗耀祖”的劫数：“对景伤前事，怀才误此身，余生料无几，空负九重仁”。

时代就像一部影像机，循环播放着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镜头：“父贵子荣”、“夫贵妻荣”、“子贵祖荣”。在当下社会，有多少人还在魔咒之下演绎着和珅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？